

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的 多维耦合机制探索

薛诗怡 朱强¹

【摘要】：如何让边疆乡村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融合的美丽家园，是当前边疆治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严峻挑战。从云南非遗文化资源的现实状况看，云南民族地区边疆治理目前存在文化要素缺失所带来的治理模式单一、治理成效有限与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云南纳西族、傣族、拉祜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践证明，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存在多重耦合机制：非遗产业化在保障边疆稳定，推进边疆繁荣、增强边疆文化传承、引领社会风尚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中分离出经济价值，将其经济价值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关键词】：云南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业化 边疆治理 多维耦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1）06-0155-06

一、引言

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流传于各民族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丰富。当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企业逐渐增多，各产业链之间的传动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¹但如何在科学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筛选、开发具有产业化发掘特色的非遗文化项目，仍是当前学界与业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云南省有25个边境县（市）²，是全国边境县（市）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边疆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探索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与边疆治理的多维耦合机制，不仅对当前的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边疆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2021年8月27—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进程。³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云南已建成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档案，全面实施非遗记录与数字化保护工程。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增至130项以上，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增至500项以上，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增至100人以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达1500人；国家级与省级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基地为25个，省级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为100个，全省非遗传承基地和传习馆/所/室已有300个以上，云南各级非遗项目已达1.1万多项。⁴为更好促进非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国家与云南省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非遗文化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

本文选取的纳西族、傣族和拉祜族是云南特有民族，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这3个民族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其民族非遗产业化开发的成功经验，发现在云南非遗文化资源中，蕴含着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审美等多重价值，正在成为拉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适度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生产、体验、展示等方式与其他产业结合，保护、传承与发展非物质

¹**作者简介**：薛诗怡，女，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传播、艺术管理研究。朱强，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公益性旅游精准扶贫现存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号：17XMZ056）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遗产，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二、传统边疆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目前，传统的边疆治理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制约了陆地边疆新功能的形成和发挥。⁵因此，转变边疆治理思路，拓展治理资源成为当前中国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传统边疆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第一，治理模式单一。一直以来，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以硬治理模式为主，通过严格法制管理达到对边疆的治理。然而，一味地用硬治理的方式也会降低治理灵活性，缺乏“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感召性，增加边疆治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情绪，造成忽视边疆地区特殊性和民族特殊性的问题，进而影响边疆治理的效果。⁶

第二，治理成效有限。长期以来，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多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物”的因素，而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仅停留在原则层面。⁷这一重“物”轻“人”的观念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弊端：首先，思维陈旧。思想的落后影响了兴边富民政策实施的成效。其次，认知偏差。部分干部与边民重视经济兴边与经济脱贫，忽视文化兴边与精神脱贫。最后，部分边民还存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现象，黄赌毒和跨境犯罪等问题时有发生，成为边疆乡村治理之癌。

第三，缺乏可持续性。目前，大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的差距较大。边疆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基础建设起步晚、投资大、返贫现象比较突出；乡村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能形成人才、资金、技术与项目的集聚效应。因此，转变边疆治理思路，拓展治理资源，重视边疆治理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成为当前中国边疆治理中亟待重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边疆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边疆经济社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进一步调整治理模式，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同时，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合理使用中央财政优惠等政策资源，因地、因时制宜，切实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保障边疆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⁸因此，重视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因素，推进非遗产业化，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助于保存民族文化，而且能够满足边疆各族群众的需求，唤醒边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激发出边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育边疆各族人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三、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的多维耦合机制

通过开发非遗文化产业，使其发挥增进民族交流、增加民众收入、增强文化自信、引领社会风尚的多重影响，不仅可以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而且可以推进当前边疆繁荣稳定发展。

（一）“以文定边”：非遗产业化促进边疆稳定

“以文定边”即“文化戍边”，通过非遗产业化发展，加强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民族非遗文化，不仅为云南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动力，⁹还扩大了族际间的交往与了解，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谊和团结。

云南丰富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边疆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正日益显现，已成为云南的显著优势。也正是因为各民族的传统文受到尊重、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以多元包容的心态欣赏和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活动，云南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云南现象”和“云南经验”，被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建设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光荣使命和重大任务。¹⁰

推进非遗产业化发展，不仅可促进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互动，而且可成为影响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

稳定的重要助力。云南居住着 16 个跨境民族，长期以来，跨境民族之间基于族缘和亲缘纽带，在婚姻、劳务、节日、宗教、教育、演艺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跨境民族节日如泼水节、目瑙纵歌节、花山节、中缅胞波狂欢节、盘王节、阔时节、龙阳节等，已成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乃至经贸交往的重要平台。节日期间，中缅、中老、中越双方跨境民族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跳舞唱歌、共度佳节；同时，还可经商做买卖，相聚叙友情、谋发展，节日成为跨境民族广交朋友、睦邻友好和展示美好形象的载体。

非遗产业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交流合作、演艺文化交流的载体。例如，傣族孔雀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国家级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宣传，非遗传人在村寨中大规模收徒传艺，对跨境而居的缅甸同一民族产生了强烈吸引力，成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支点。¹¹

东南亚是世界上民族最为众多、民族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稳定、和睦的国际关系。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经济主导权地位建设，也需要发展和输出中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就包括文化输出和交流。利用中国西南边境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的地理优势、民族跨境而居、文化交织发展互为影响的关系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以文兴边”：非遗产业化推进边疆繁荣

“以文兴边”即固边宜先富民，将非遗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再由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通过创意、拓展、嫁接、挖掘开发出具有多重价值的商品，并使其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开发出非遗产品体系，繁荣边疆的社会经济。

目前，边疆人口结构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劳务输出导致边疆地区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致使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要素——劳动者，尤其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并能社会生产中进行劳动的劳动者严重不足，导致当地发展活力渐失。因此，推进非遗产业化是留住边民、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经济驱动力量。云南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具有优良的产业开发条件，如能将民族工艺技术、歌舞、传统服饰、节庆等非遗文化元素转化为旅游产品，将能更好地发挥非遗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提升民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积极推进非遗的物态化、活态化、商品化、市场化，利用非遗发展特色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非遗产业化可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相结合，拓展边疆地区的增收模式，推动经济转型，可从根本上遏制边民外流、边疆地区乡村空心化的蔓延。

经过多年来政府和经营主体的不断努力，非遗产业出现了多样化的经营模式，推动了非遗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非遗文化的繁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¹²当前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和协调相关企业、民间团体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使之与民众的生产生活连接，形成新的文化生产力，¹³促进当地整体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成长，进而使非遗产业发展成为巩固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纽带。

纳西族东巴造纸的制作技艺产品发掘模式，就是“以文兴边”的典范。2006 年，纳西族东巴造纸技艺入选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这一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如今，东巴造纸技艺类产品已被发掘成了休闲体验产品、手工艺产品，成了丽江文化旅游开发中具有代表性的非遗手工艺类产品。其在传承文化遗产的同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¹⁴

综上，推进非遗文化与产业化相结合，引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商业观念，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优势产业，是兴边固边的重要举措。对此，应积极挖掘当地历史人文特色和民俗特色，加大对人文景观的投资力度。¹⁵同时，激发传承人及当地民众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¹⁶，并以此为契机，激活“归雁经济”，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将外界的资金、技术带回当地，与当地丰富的非遗文化相结合，推进非遗产业化发展，提升当地经济活力，带动边民增收，兴边富民，助力乡村振兴。

（三）“以文润边”：非遗产业化增强边疆文化传承

“以文润边”即“以德治边”。非遗文化中富含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保障社会和谐、弘扬正气、稳定边疆的重要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的 DNA，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当地人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神家园。¹⁷通过推动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可培养非遗文化的群众基础，激发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

澜沧拉祜族老达保村非遗歌舞产业化带动模式就是“以文润边”的典型案例。老达保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属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区，生活着 114 户，500 多位拉祜族村民。2006 年以前，老达保村人年均纯收入仅 1000 元左右。其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和民间舞蹈《芦笙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拉祜族摇摆舞、迁徙史诗《根古》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人，市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 人。老达保村民保留传承了拉祜族的传统文化，并逐渐将其产业化。

在非遗歌舞文化的熏陶下，以及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村民李娜裸牵头成立了澜沧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并创作了实景舞台大型歌舞《快乐拉祜》，演出收入达 332 万元，接待游客 10.65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00 多万元，并出品了拉祜族歌舞系列光碟。其歌舞演艺不仅带动了如旅游休闲、农特产品合作农庄等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民族服装加工、工艺品生产，率先在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和文化与农业结合经营模式等方面探索出新路径，“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成效明显。如今，老达保村民正在将老达保村建设成为澜沧县乃至云南省最具特色的民族乡村旅游示范区，成为“一把吉他走四方，快乐拉祜美名扬”的歌舞之乡。

总之，非遗演艺产业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是提升文化自信、提高文化创造力、增强民族信心的关键路径。¹⁸

（四）“以文育民”：非遗产业化引领社会风尚

“以文育民”即“文化育人”。非遗文化包含有民族精神、社会规范与人的行为准则。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体现了对人精神的塑造。¹⁹在文化兴边战略中，民族非遗文化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引领社会风尚，提升民众幸福感。

民族非遗文化具有规范人们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作用，其所具有的文化知识、手工技艺、音乐歌舞等内容，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非遗产业化能让民众参与其中，在生产活动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规范其行为准则。人们参与非遗文化活动的过程就是接受文化与美育的熏陶与洗礼的过程。过去，少数边疆地区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出现了黄赌毒沉渣泛起、民众精神空虚、道德水准滑坡等问题。但非遗产业化发展带动了当地广大民众参与生产活动，既让当地居民找到维持生计的良策，也让民众有了充实的生活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黄赌毒等问题。由此，民族非遗文化可以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其中，进而引领社会风尚的发展方向。²⁰

傣族曼掌村非遗文旅融合农庄体验发掘模式就是“以文育民”的典型代表。西双版纳景洪市勐养镇曼掌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较好的傣族村寨，也是景洪市首批命名的民俗文化古村寨，有 500 多年的历史，共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 18 项。2014 年，曼掌村被定为云南省文化农庄建设项目试点村。曼掌村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全面挖掘，着力打造了章哈、傣族慢轮制陶、傣拳、贝叶经制作、葫芦丝制作及演奏、傣族剪纸、傣族织锦、傣族手工造纸技艺、象脚鼓制作等 18 项非遗项目展示或体验区，提升了傣族非遗文化资源价值，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村庄环境与村民的精神风貌。现在，曼掌村已形成了农业、旅游、手工艺品、服装、演艺、非遗文化体验等产品，将一个傣族村寨打造成为一个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具有傣族传统文化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农庄，呈现出了一幅“家家是传习馆，户户是加工坊，楼楼是展销点，个个是文化人”的美丽和谐画卷。这不仅让非遗文化得到了保护、传承与发展，还提升了村民生活水平，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非遗文化对当地形象塑造、社会生活都会有较大的影响。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能激发民众对民族非遗文化的兴趣，加深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由此，非遗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在物质层面成为当地民众增收的重要途径，而且在精神层面提升了当地民众的幸福感。

四、推进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提升边疆治理水平的策略

非遗文化对边疆的繁荣、稳定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承、社会风气的改善有着显著作用。为更好发挥非遗文化产业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还应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边疆社会治理水平

政府相关部门应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引导非遗产业的发展，优化非遗产业要素配置。维护非遗产业的生态环境与公平竞争，推动非遗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改革文化体制管理模式，为非遗产业化发展释放制度红利。制定相应的政策、规范、奖惩制度，通过税收、财政等措施达到非遗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产业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有非遗传承人、经营者、政府等分别以技术、资本、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其中的非遗产业体系，明晰产权与经营权，建立科学有效的非遗产业开发机制，规范非遗产业化市场规范，促进非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边疆治理更多地依赖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构建而成的“软实力”，²¹政治治理具有刚性，文化治理具有柔性，文化要素是边疆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只有推进边疆地区民众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中华民族认同，边疆治理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取得实效。而非遗产业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构建民族精神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是有效实现边疆共建共治共享的必要条件。

（二）促进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延伸，提升边疆社会生产力水平

非遗产业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正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抢占的高地。在这种背景下，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遵循经济利益和社会综合效益双重原则，采取有限制的产业化政策。²²

非遗文化中有部分内容具有市场化要素，应将其经济价值剥离出来，分析其资源特色与市场构成，并进行精准定位，对富含经济价值的部分进行产品研发设计，将其产业化要素与相关产业链结合，与相关产业交叉融合，延伸产业链条，促使其向产业化、生产组织化发展。同时，可在工艺、歌舞、民俗、饮食、建筑等非遗资源中，提炼和融入现代化生产方式与时尚元素，将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与高附加值的旅游、休闲、度假、工艺品、电子音像制品等，在发掘中保护、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提高当地民众生活水平。

另外，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全要素、全方位支撑体系的产业，品牌化经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集群体系。首先，要对市场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分析相关信息，打造品牌特色，树立企业形象；其次，采用国内、国际的产品质量标准管理技术与指标体系，从市场的现状与竞争格局出发，挖掘非遗文化的历史渊源、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确定品牌灵魂，并进行品牌维护。

（三）建立非遗传承人激励机制，培养一批从事非遗文化产业的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点是“艺在人身，艺随人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这一特点决定了传承人在非遗文化资源中的重要地位。²³

非遗产业化发展亟需善于管理经营、创意策划的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也需要懂技术、有技艺的工匠型人才。非遗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若不能解决传承人的生计，就不能持续发展非遗产业。所以，只有当传统技艺成为传承人的谋生手段时，传统技艺才会焕发生机，非遗也才能成为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产业，才能衍生出非遗工艺品制造、文化旅游、休闲农牧业、体育竞赛、影视版权、文艺演出等不同业态。因此，应该把创意、包装、推广非遗产品与培育一批非遗文化传承人相结合，增强非遗文化的生机、活力。

（四）建立非遗产业保护与开发反哺机制，营造边疆精神家园

建立非遗文化与文化产业良性互动机制，发展非遗文化的生产性保护，使非遗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良性互动，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²⁴同时，坚持政府对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的价值、政策与舆论引导，为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创设条件与配套服务。非遗产业在获得经济效益时，要资金回馈遗产保护机制，杜绝开发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实施非遗资源的动态保护。非遗产业化要在不断保护、传承、创新与重构中发展，在保持其核心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建构现代、时尚、符合人们需求的多元产品与服务体系，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链。

五、结语

随着科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中新的战略增长点。非遗文化的传承不能仅停留在博物馆里，更要融入生活、贴近时代、应时创新、活态发展。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发掘非遗的经济价值，进行品牌化经营，提升其附加价值，并进行产业化建设；其次，从传授知识技艺入手，发掘其教育价值；再次，提升非遗产业的文化软实力，以德治理，实现文化安边。非遗产业化不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得到反哺，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从非遗资源的多重价值中分离出经济价值，科学合理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业连接，将其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以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是促进边疆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注释：

1 崔素洁、方耀：《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推进西藏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以藏戏为例探讨西藏文化产业的开发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484-485页。

3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

4 郭大伟：《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构想的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11期。

5 周平：《陆地边疆治理面临资源困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6 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晋阳学刊》2013年第5期。

7 刘玲：《兴边富民行动与民族团结进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8 李俊清：《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44页。

-
- 9 杨文顺、高路：《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和谐社会构建互动关系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 10 郭家骥：《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 11 郭家骥：《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
- 12 杨军昌、颜全己：《非遗茶文化特征与茶文化产业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2期。
- 13 文冬妮：《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空间建设研究》，《科技资讯》2018年第34期。
- 14 王鹤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分析》，《中国文化报》2008年7月16日，第3版。
- 15 杨明洪、王周博：《我国陆地边境地区“空心化”的类型、成因与治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16 文冬妮：《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空间建设研究》。
- 17 赵学先主编：《云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 18 张瑛、高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行政管理研究——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 19 关桂霞：《各美其美多元共生和谐发展：青海民族文化发展的几点认识》，《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 20 关桂霞：《各美其美多元共生和谐发展：青海民族文化发展的几点认识》。
- 21 闫国疆：《信仰教育、边疆治理与国克家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 22 赵学先主编：《云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第150页。
- 23 邓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纳入旅游产品体系研究》，《学理论》2011年第26期。
- 24 黄永林：《生产是最好的保护》，《光明日报》2011年10月7日，第4版。